

事务所规模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

陈丽红, 李明艳

摘要: 高质量的审计主体是提升审计质量的助推器,也是影响审计报告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以2016—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具体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事务所规模越大,其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越多、文本篇幅更长,且更愿意出具结论性评价。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具体类型来看,规模大的事务所更倾向于披露文本相似度低、公司特性层面、归因清晰的关键审计事项,并更愿意采用积极的结论性评价方式进行具体披露。此外,规模越大的事务所披露充分的关键审计事项后,客户的可控性应计利润越低。

关键词: 关键审计事项; 审计报告; 审计准则; 会计师事务所; 注册会计师

中图分类号: F239.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19(2021)05-0133-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JY208)

作者简介: 陈丽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李明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3)。

一、引言

审计报告的重要作用是提高财务报告的可信度和增加财务信息价值,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审计理论界和实务界意识到,传统的审计报告在透明度和决策有用性方面存在重大问题(IAASB, 2011)。为此,各国监管部门陆续发起审计报告改革,试图探寻一套“与时俱进,满足报告使用者需求”的审计报告准则,其核心在于增加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以提高审计过程的透明度和审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现有文献也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审计质量(Brasel et al, 2016; 韩冬梅等, 2018; Kachelmeier et al, 2019; 张金丹等, 2019)、审计收费(Gutierrez et al, 2018; Reid et al, 2019)和审计报告信息含量(Sirois et al, 2018; 王艳艳等, 2018; 陈丽红等, 2019; Köhler et al, 2020)等产生显著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要对标国际一流水平,大力发展金融、研发、设计、会计、法律、会展等现代服务业,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和竞争力。”^①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近年来也高度重视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鼓励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实现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互动。截至目前,全国会计师事务所数量达到9600余家,其中50家事务所业务收入过亿元,15家事务所业务收入超过10亿元^②,这意味着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长足进步。现有文献发现,大规模事务所具备更强的专业胜任能力,更高的独立性和更低的经济依赖度(DeAngelo, 1981; Dye, 1993; Chen et al, 2019),能够高效识别和应对重大错报风险(刘向强等, 2019; 薛杰等, 2020),主动揭示管理层错误或激进的会计处理,从而有助于审计质量的提升。但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审计意见、审计收费以及报表质量等审计产出的角度研究审计主体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① 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0月14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0529775406567143&wfr=spider&for=pc>.

^② 数据源自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赵鸣骥在“纪念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恢复重建暨行业改革发展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2012/t20201228_3637609.htm.

较少从审计主体角度探究其对审计过程的影响。那么,事务所规模是否会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产生影响?事务所规模不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文本特征是否存在差异?大规模事务所是否通过披露更充分的关键审计事项提高了审计质量?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战略以及审计报告改革的制度背景,以2016—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独特视角检验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报告改革的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本文发现规模越大的事务所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越充分,这不仅丰富了事务所规模经济后果的文献,也拓展了审计报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第二,本文发现大规模的事务所通过充分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促进了审计质量的提高,这有助于监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更好地评估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和审计报告改革的效果;第三,本文发现事务所规模越大,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相似度越低,更愿意披露公司特性层面的事项,在关键审计事项归因方面也更清晰,并倾向于针对关键审计事项采用积极结论评价,这为事务所优化关键审计事项的具体披露提供了可以参考的路径。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财政部2016年12月发布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第七条指出,关键审计事项是指注册会计师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也是从注册会计师与治理层沟通的事项中选取的事项。由此可知,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会受到会计师事务所和被审计单位的共同影响。现有研究发现事务所规模是高质量审计的表征,相较于小规模事务所,大规模事务所的声誉风险和诉讼风险更高,因此大规模事务所会持续提升质量控制程序,更好地识别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降低被审计单位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而提供更好的审计质量(Chen et al, 2019)。但现有研究大多数都是从报表质量、审计意见、财务重述等事后的角度检验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较少研究能够穿透审计过程的迷雾探究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关键审计事项由事项描述段和审计应对段两部分构成,本轮审计报告改革就是通过事项描述段和应对段来拨开审计过程的迷雾,让财务报表信息使用者知悉事务所如何判断审计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事项,在此基础上又执行了哪些审计程序以消除审计风险。因此,本文认为关键审计事项是观察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过程关系的最佳窗口之一,并认为大规模事务所基于诉讼风险和声誉风险的考量,无论是从专业胜任能力还是独立性等方面,都能充分披露关键审计事项。

首先,就专业胜任能力而言,相比小规模事务所,大规模事务所拥有优秀的专业人才、先进的审计技术以及丰富的审计经验(Francis et al, 2009),因而具备更强的风险敏感度,对不确定事项的识别更加准确。在风险评估和应对阶段,大规模事务所对准则较深的理解和较强的执行能力以及更严格、更注重细节的质量控制程序(Chen et al, 2019; 薛杰等, 2020),能够帮助审计师充分识别客户可能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出合理有效的审计程序,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水平(刘向强等, 2019)。在与治理层和管理层沟通阶段,大规模事务所凭借良好的品牌声誉及较高的专业水准,能够说服治理层与管理层及时披露坏消息,抑制其操纵信息的机会主义行为,并接受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和内容的认定,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因此,相比于小规模事务所,大规模事务所凭借其专业胜任能力,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得更充分。

其次,就独立性而言,大规模事务所受声誉机制(DeAngelo, 1981)影响更大,一旦发生审计失败,其面临客户流失从而丧失租金的风险远高于小规模事务所。较高的声誉风险,促使大规模事务所主动揭示管理层错误或激进的会计处理,借助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抑制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违规行为(杨明增等, 2018),从而降低审计失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相比小规模事务所,大规模事务所收入来源多样,单个客户审计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小,对客户经济依赖度更低;在与管理层和治理层沟通关键审计事项时,大规模事务所更不容易被收买或合谋,而是能够保持较高的独立性,并如实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因此,事务所规模越大,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越充分。

最后,就法律责任而言,基于“深口袋”理论(Dye, 1993),大规模事务所的诉讼风险通常较高,而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能够减轻外界对审计师法律责任的感知(Brasel et al, 2016)和审计师自我法律责任的

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事务所的诉讼风险(韩冬梅等,2018; Kachelmeier et al,2019)。心理学有罪控制理论指出,如果行动者已经采取了合理、必要的措施应对可能发生的负面事件,那么行动者受到责备的可能性会降低(Alicke et al,2008; 韩冬梅等,2018)。关键审计事项描述段反映出被审计单位当期重要风险以及未来经营问题的预兆,是审计人员在向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发送风险警示(Christensen et al,2014);关键审计事项应对段是审计人员为避免发生重大错报采取的合理、必要的措施,可以帮助投资者和监管部门更加清晰了解审计程序整个过程。因此,即使企业日后出现重大错报风险,投资者和监管部门也可能会酌情减轻事务所的法律责任。相比小规模事务所,大规模事务所有更强烈的动机规避法律风险、维护自身声誉,因此也会更倾向于充分披露关键审计事项,降低潜在的诉讼风险。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大规模事务所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更充分,因此提出假说: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得越充分。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我国A+H股上市公司自2016年率先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201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中增加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因此本文选取2016—2019年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并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2)剔除ST和*ST上市公司;(3)剔除当年由两家及以上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4)剔除相关财务指标缺失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8995个观测值。本文的财务数据和审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事务所规模数据来自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CICPA)网站,关键审计事项数据为手工搜集整理得到。为了消除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99%分位上进行了缩尾处理。

(二)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为验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Adequacy = \beta_0 + \beta_1 Big4 + \beta_2 Big10 + \sum Controls + Fixed_Effect + \varepsilon \quad (1)$$

1. 被解释变量

借鉴周中胜等(2020)和陈丽红等(2021)的度量方式,本文从以下三方面衡量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Adequacy*):(1)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Num*),为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个数;(2)关键审计事项的文本篇幅(*LnWords*),为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描述段和应对段的总字数取自然对数;(3)结论性评价的数量(*LnCon*),为结论性评价的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Num*、*LnWords*和*LnCon*越大,说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越充分。

2. 解释变量

国内早期文献认为,相较于国内事务所,国际“四大”事务所规模大、审计质量高,因此通常仅以国际“四大”作为事务所规模的替代变量。但随着财政部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做大做强”战略的持续推进,国内大所无论在规模还是质量上都得到了巨大提升,国际“四大”占绝对优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因此,近期文献开始将国际“四大”和国内“十大”同时作为事务所规模的替代变量开展研究。已有研究发现国际“四大”和国内“十大”在提高审计质量(于鹏等,2018)、促进企业资本结构优化调整(张娟等,2010)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借鉴已有文献,同时检验国际“四大”、国内“十大”与国内其他所在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性。借鉴于鹏等(2018)的衡量方法,将事务所分为三类并设置*Big4*和*Big10*两个虚拟变量,第一类为国际“四大”所,第二类为中注协每年公布的《业务收入前100家会计师事务所信息》中的前十大国内事务所^①,第三类为“四大”和“十大”以外的其他所,前两类统称为大规模事务所,第三类称为小规模事务所。当事务所为国际“四大”时,*Big4*取1,否则为0;当事务所为国内“十大”时,*Big10*取1,否则为0。

^① 2018年以前,百强事务所排名是依据事务所业务收入,2019年后则是在收入之外增加八个指标综合打分排序。本文2019年的数据延续以往年度按照业务收入排序的方式,手工筛选出业务收入前十大国内事务所,以保证指标度量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3.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文献(Velte,2018) ,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公司基本特征、治理因素以及事务所特征的影响,设置 15 个控制变量,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控制变量的具体定义和说明见表 1。

表 1 控制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变量衡量
<i>Size</i>	公司规模	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
<i>Lev</i>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i>CFO</i>	经营性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除以总资产
<i>ROA</i>	盈利能力	净利润除以总资产
<i>Loss</i>	亏损	净利润为负时取 1,否则为 0
<i>Growth</i>	成长性	当年营业收入与上年营业收入之差除以上年营业收入
<i>MB</i>	市值账面比	流通股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
<i>Seg</i>	经营分部数量	经营分部数量取自然对数
<i>Age</i>	上市年限	距离首次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日期的天数除以 365 后取自然对数
<i>Top1</i>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第一大股东所持股份数除以总股数
<i>Inshld</i>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机构投资者持股数除以总股数
<i>Clean</i>	审计意见	标准无保留意见时取 1,否则为 0
<i>Change</i>	事务所变更	事务所发生变更取 1,否则为 0
<i>Delay</i>	审计时滞	审计报告签署日或审计完成日距离资产负债表日的天数取自然对数
<i>Special</i>	事务所行业专长	事务所在某行业审计费用占该行业总审计费用之比大于 10% 时取 1,否则为 0

四、实证检验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为了便于解释,本文增加了未经过对数化处理的关键审计事项总字数(*Words*) 和结论性评价数量(*N_Conclusion*) 。关键审计事项数量(*Num*) 的最小值、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 1、6 和 2.071,表明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数量分布在 1 个到 6 个之间,平均披露数量约为 2 个;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篇幅(*Words*) 的均值为 1254.112,标准差为 514.646,表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总字数平均约为 1254 个字,且不同公司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篇幅存在较大差异;结论性评价数量(*N_Conclusion*) 的均值为 0.280,最小值和中位数为 0,最大值为 5,说明仅少数样本公司的关键审计事项得到了结论性评价;“四大”事务所规模(*Big4*) 的均值为 0.059,表明样本中大约有 5.9% 的公司是由国际“四大”审计;“十大”事务所规模(*Big10*) 的均值为 0.687,表明样本中大约有 68.7% 的公司是由国内“十大”审计。

表 3 列示了单变量均值检验结果:第(1)列是国际“四大”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文本篇幅以及结论性评价数量的均值,分别为 2.180、7.150 和 0.301;第(2)列是国内“十大”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文本篇幅以及结论性评价数量的均值,分别为 2.085、7.071 和 0.146;第(3)列是其他小所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文本篇幅以及结论性评价数量的均值,分别为 2.007、6.978 和 0.129。从均值差 T 检验结果看到,国际“四大”与国内“十大”的均值差 [(1) - (2)] 以及与其他小所的均值差 [(1) - (3)] 均大于 0,且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国内“十大”与其他小所的均值差 [(2) - (3)] 也大于 0,且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相比于小规模事务所,大规模事务所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更多、文本篇幅更长、结论性评价数量更多,初步验证了假说,即事务所规模越大,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得越充分。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i>Num</i>	8995	2.071	0.653	1	2	6
<i>Words</i>	8995	1254.112	514.646	225.000	1182.000	7493.000
<i>N_Conclusion</i>	8995	0.280	0.734	0.000	0.000	5.000
<i>Big4</i>	8995	0.059	0.236	0.000	0.000	1.000
<i>Big10</i>	8995	0.687	0.464	0.000	1.000	1.000

表3 单变量均值检验

变量	(1) 国际“四大”		(2) 国内“十大”		(3) 其他小所		均值差(T-test)		
	样本数	均值	样本数	均值	样本数	均值	(1)-(2)	(1)-(3)	(2)-(3)
<i>Num</i>	534	2.180	6183	2.085	2278	2.007	0.094***	0.172***	0.078***
<i>LnWords</i>	534	7.150	6183	7.071	2278	6.978	0.079***	0.172***	0.094***
<i>LnCon</i>	534	0.301	6183	0.146	2278	0.129	0.155***	0.172***	0.017***

注: ***, **, *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以下各表同。

(二) 回归结果分析

表4第(1)列报告了事务所规模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Num*)的回归结果,*Big4*和*Big10*的系数显著为正;第(2)列报告了事务所规模与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篇幅(*LnWords*)的回归结果,*Big4*和*Big10*的系数显著为正;第(3)列报告了事务所规模与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价数量(*LnCon*)的回归结果,*Big4*和*Big10*的系数显著为正。上述回归结果表明国际“四大”和国内“十大”比小规模事务所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更充分,即事务所规模越大,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得越充分,本文假说得到验证。

表4 事务所规模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

变量	(1) <i>Num</i>	(2) <i>LnWords</i>	(3) <i>LnCon</i>
<i>Big4</i>	0.050* (1.91)	0.136*** (4.32)	0.190*** (5.05)
<i>Big10</i>	0.040*** (3.71)	0.096*** (7.03)	0.042*** (3.36)
<i>Size</i>	0.026*** (5.41)	0.030*** (4.74)	0.004 (0.66)
<i>Lev</i>	0.104*** (3.35)	0.130*** (3.22)	0.035 (0.90)
<i>CFO</i>	-0.179*** (-2.74)	-0.183** (-2.16)	-0.029 (-0.35)
<i>ROA</i>	-0.497*** (-6.10)	-0.455*** (-4.30)	-0.012 (-0.13)
<i>Loss</i>	0.012 (0.67)	0.024 (1.11)	0.017 (0.79)
<i>Growth</i>	0.026*** (2.84)	0.042*** (3.47)	0.006 (0.52)
<i>MB</i>	-0.005 (-0.95)	-0.011* (-1.79)	0.010 (1.59)
<i>Seg</i>	0.026*** (3.66)	0.031*** (3.24)	0.001 (0.08)
<i>Age</i>	-0.009 (-1.54)	-0.022*** (-2.77)	-0.001 (-0.06)
<i>Top1</i>	-0.100*** (-2.93)	-0.135*** (-3.07)	-0.045 (-1.03)
<i>Inshld</i>	0.132 (1.60)	0.232** (2.14)	0.003 (0.02)
<i>Clean</i>	0.088*** (3.37)	0.129*** (4.09)	0.033 (1.29)
<i>Change</i>	0.028*** (2.71)	0.032** (2.47)	0.016 (1.17)
<i>Delay</i>	0.069*** (2.88)	0.104*** (3.33)	0.009 (0.30)
<i>Special</i>	-0.018** (-2.13)	-0.019* (-1.76)	-0.111*** (-10.65)
<i>Year/Industry</i>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205 (-1.31)	5.718*** (28.67)	-0.027 (-0.13)
Adj_R ²	0.006	0.075	0.028
N	8995	8995	8995

注: 括号内为t值, 经过 White 异方差稳健性修正; 以下各表同。

(三) 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问题

为了缓解事务所自选择问题,本文采用 Heckman 两阶段估计法进行处理。借鉴 Chaney 等(2004)、陈小林等(2013)和周泽将等(2020)的做法,选择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经营性现金流量(*CFO*)、资产流动比率(*Cata*)、盈利能力(*ROA*)、亏损(*Loss*)、成长性(*Growth*)、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及行业、年度虚拟变量,对公司是否聘请大规模事务所进行第一阶段 Probit 估计,并计算逆米尔斯系数(Inverse Mill's Ratio,简称 IMR),随后将 IMR 放入第二阶段模型中进行估计。表 5 的回归结果表明,除了国际“四大”与关键审计事项数量(*Num*)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之外,国际“四大”与关键审计事项篇幅(*LnWords*)和结论性评价数量(*LnCon*),国内“十大”与关键审计事项数量(*Num*)、篇幅(*LnWords*)和结论性评价数量(*LnCon*)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控制了自选择问题后,本文结论依然不变。

表 5 事务所规模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Heckman 两阶段估计)①

变量	第二阶段		
	(1) <i>Num</i>	(2) <i>LnWords</i>	(3) <i>LnCon</i>
<i>Big4</i>	0.121(1.45)	0.171*(1.69)	0.210*(1.65)
<i>Big10</i>	0.041*** (3.81)	0.099*** (7.19)	0.041*** (3.32)
<i>IMR</i>	-0.052(-1.23)	-0.020(-0.40)	-0.011(-0.17)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ndustry</i>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129(-0.78)	5.722*** (27.34)	-0.009(-0.04)
Adj_R ²	0.006	0.075	0.027
N	8959	8959	8959

考虑到国际“四大”的客户质量普遍高于非“四大”事务所(Francis et al, 2014),本文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进一步缓解“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选取模型(1)中的公司特征变量对事务所规模(*Big4*)进行 Logistic 回归,并根据得到的倾向得分对样本进行 1:3 的最近邻匹配,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不存在显著差异,然后对配对后样本重新进行回归。表 6(1)~(3)列的回归结果表明,事务所规模(*Big4*)与关键审计事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正相关,说明在控制公司特征差异后,本文的结论仍保持不变,即大规模事务所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更充分。

为了更进一步缓解内生性问题,建立事务所规模与关键审计事项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参考 Lai 等(2020)的方法,采用 Change 模型进行稳健性分析,旨在观察事务所规模发生变化,是否会导致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随之发生改变。新生成虚拟变量事务所规模变化(*DBig4*、*DBig10*),如果公司上一年聘任非国际“四大”事务所(国内“十大”事务所),本年聘任国际“四大”事务所(国内“十大”事务所),则 *DBig4* (*DBig10*)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1,不变则取值为 0。另外,因变量和所有控制变量均取与上年的差值。重新回归后的结果如表 6(4)~(6)列所示,除了 *DBig10* 与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价数量变化(*DLnCon*)正相关但不显著之外,事务所规模变化(*DBig4*、*DBig10*)与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变化(*DNum*)、文本篇幅变化(*DLnWords*)和结论性评价数量变化(*DLnCon*)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事务所规模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关系可能是因果关系,且本文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① 出于篇幅考虑,表 5 未列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以及第二阶段控制变量结果。读者如有需要请联系笔者获取,下同。

表 6 事务所规模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PSM 和 Change 模型)

变量	(1) <i>Num</i>	(2) <i>LnWords</i>	(3) <i>LnCon</i>	变量	(4) <i>DNum</i>	(5) <i>DLnWords</i>	(6) <i>DLnCon</i>
<i>Big4</i>	0.056* (1.65)	0.153*** (3.58)	0.153*** (3.44)	<i>DBig4</i>	0.187*** (2.582)	0.172*** (3.207)	0.275** (2.331)
—	—	—	—	<i>DBig10</i>	0.121*** (6.041)	0.071*** (4.672)	0.033 (1.410)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i>D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ndustry</i>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ndustry</i>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708** (-2.04)	5.244*** (11.14)	0.201 (0.44)	Constant	-0.183** (-2.371)	-0.068 (-1.553)	0.004 (0.294)
Adj_R ²	0.011	0.111	0.050	Adj_R ²	0.018	0.028	0.012
N	1574	1574	1574	N	5314	5314	5314

2. 更换事务所规模衡量方式

借鉴 Francis 等(2009)的研究,采用客户数量和审计费用替换衡量事务所规模。其中,客户数量(*LnCust*)为该事务所在本年度审计的所有客户数取自然对数,审计费用(*LnAuditfee*)为该事务所收取的所有审计费用取自然对数。表7第(1)、(3)、(5)列结果显示,事务所客户数量(*LnCust*)与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Num*)和文本篇幅(*LnWords*)显著正相关,与结论性评价数量(*LnCon*)正相关但不显著。表7第(2)、(4)、(6)列结果显示,事务所审计费用(*LnAuditfee*)与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Num*)、文本篇幅(*LnWords*)和结论性评价数量(*LnCon*)显著正相关。上述结果表明,更换主要变量衡量方式后,结果依旧稳健。

表 7 事务所规模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客户数量和审计费用)

变量	(1) <i>Num</i>	(2) <i>Num</i>	(3) <i>LnWords</i>	(4) <i>LnWords</i>	(5) <i>LnCon</i>	(6) <i>LnCon</i>
<i>LnCust</i>	0.015*** (3.25)	—	0.037*** (6.00)	—	0.005 (0.82)	—
<i>LnAuditfee</i>	—	0.077*** (8.02)	—	0.120*** (9.46)	—	0.057*** (3.69)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ndustry</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266* (-1.69)	-0.704*** (-4.23)	5.567*** (27.68)	4.940*** (22.97)	-0.077 (-0.37)	-0.440* (-1.90)
Adj_R ²	0.006	0.006	0.071	0.081	0.018	0.022
N	8995	8982	8995	8982	8995	8982

3. 控制签字审计师个人特征和审计风险

现有文献发现审计师性别、学历、岗位、胜任能力等个人特征以及客户审计风险会影响审计报告产出(Gul et al,2013)。因此,关键审计事项将不可避免受到审计师个人特征和审计风险的影响。为了缓解可能的遗漏变量对结论造成影响,本文在主回归中进一步控制签字审计师的性别(*Gender*)、学历背景(*Degree*)、是否为合伙人(*Partner*)、是否为党员(*Party*)、是否具有行业专长(*PartnerSpecial*)、客户是否发生过财务重述(*Restate*)等变量。表8第(1)~(3)列结果显示,在控制审计师个人特征和审计风险后,事务所规模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充分性显著正相关,与主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表8 事务所规模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控制审计师个人特征和审计风险、改变样本区间)

变量	(1) Num	(2) LnWords	(3) LnCon	(4) Num	(5) LnWords	(6) LnCon
Big4	0.048* (1.72)	0.134*** (3.97)	0.206*** (5.06)	0.054* (1.86)	0.143*** (4.15)	0.251*** (6.08)
Big10	0.024** (2.03)	0.073*** (4.84)	0.039*** (2.84)	0.045*** (3.64)	0.098*** (6.12)	0.097*** (6.01)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161 (-0.97)	5.707*** (26.48)	-0.101 (-0.47)	-0.186 (-1.10)	5.638*** (26.16)	-0.290 (-1.35)
Adj_R ²	0.006	0.077	0.037	0.005	0.078	0.047
N	7671	7671	7671	5813	5813	5813

4. 改变样本区间

2016年样本中仅包括A+H股公司,其中65.59%的公司由国际“四大”审计,其余均由国内“十大”事务所审计(路军等,2018),因此2016年缺少小规模事务所的相关数据。加之受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审计人员可能会在2019年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中强调疫情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本文的结果。参考王艳艳等(2018)的做法,表8第(4)~(6)列单独以2017年、2018年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重新进行回归,结果与前文结果保持一致。

五、进一步分析

(一) 事务所规模与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特征披露

1. 事务所规模与结论性评价语气

有研究表明,积极的结论性评价投资吸引力更高(韩冬梅等,2018),本文借鉴张继勋等(2019)的研究,将结论性评价分为积极结论性评价和消极结论性评价。当审计人员对关键审计事项做出“……的估计是合理的”“……处理是恰当的”之类的评价时,本文将其定义为积极结论性评价;当审计人员以消极方式提出结论性评价,如“……估计是可接受的”“没有发现……存在重大问题”时,本文将其定义为消极结论性评价。本文采用关键审计事项段中积极结论性评价的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LnPosCon)来衡量积极结论性评价情况,消极结论性评价的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LnNegCon)来衡量消极结论性评价情况。表9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事务所规模与积极结论性评价显著正相关。表9第(2)列回归结果显示,国内“十大”与消极结论性评价显著负相关,国际“四大”与消极结论性评价正相关但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大规模事务所更倾向于披露积极的结论性评价。

表9 事务所规模与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特征

变量	(1) LnPosCon	(2) LnNegCon	(3) Similarity
Big4	0.171*** (5.01)	0.009 (0.64)	-0.039** (-2.41)
Big10	0.053*** (4.88)	-0.008** (-1.99)	-0.013** (-2.04)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045 (-0.24)	0.030 (0.48)	-0.235** (-2.49)
Adj_R ²	0.024	0.009	0.657
N	8995	8995	8995

2. 事务所规模与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相似度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存在过度标准化现象(Brasel et al,2016; 冉明东 等,2017)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审计报告的沟通价值。相比于小规模事务所,大规模事务所凭借其专业的审计能力、丰富的审计经验以及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能够充分识别被审计单位可能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对被审计单位不同年度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实披露,从而提供更多的增量信息。因此,事务所规模越大,前后年度的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相似度可能越低。本文参照 Brown 等(2011) 的做法,采用余弦相似度算法^①,计算事务所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段前后年度的文本相似度(*Similarity*) ,相似度越大,说明文本相似度越高。表 9 第(3) 列回归结果显示,事务所规模与文本相似度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事务所规模越大,前后年度文本相似度越低,且提供了更多的增量信息。

(二) 事务所规模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类型

1. 事务所规模与行业共性/公司特性关键审计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呈现明显的行业特征,如电气、热力生产与供应行业上市公司更多披露与固定资产减值相关的关键审计事项,而零售行业上市公司更多将注意力转向与成本费用相关的关键审计事项。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同行业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过度同质化,忽略了被审计单位自身特征的信息价值。相比于小规模事务所,大规模事务所能够依据其专业胜任能力,更容易挖掘到审计对象的个性问题,从而披露更多的公司特性关键审计事项。本文借鉴现有文献,将各行业中披露次数最多的,且披露总和超过该行业总关键审计事项 50% 的三类关键审计事项界定为行业共性关键审计事项,剩余事项则归类为公司特性关键审计事项。同时设置四个新变量,即行业共性关键审计事项数量($N_{industry}$) 、公司特性关键审计事项数量($N_{specific}$) 、公司特性关键审计事项占总事项的比例(CAM_{Spec}) 和公司是否披露特性事项多于行业共性事项(CAM_{Mind}) ,是则取 1,否则取 0。

回归结果如表 10 第(1) ~ (4) 列所示,除了国内“十大”(*Big10*) 与行业共性关键审计事项数量($N_{industry}$) 和公司是否披露特性事项多于行业共性事项(CAM_{Mind})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之外,其余事务所规模均与 $N_{specific}$ 显著正相关,与 $N_{industry}$ 显著负相关,说明相较于小所,大规模事务所会披露更多的公司特性关键审计事项而不是行业共性事项。另外,事务所规模与 CAM_{Spec} 和 CAM_{Mind} 也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大所披露的公司特性关键审计事项占总事项的比例较高且披露的公司特性关键审计事项多于行业共性关键审计事项。综上所述,大规模事务所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时,能够充分挖掘被审计单位的个性信息,帮助财务报表使用者进一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

2. 事务所规模与关键审计事项归因披露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第十三条指出,审计师在逐项描述关键审计事项时,应当说明该事项被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的原因。从我国目前披露情况来看,只有部分事务所在披露部分关键审计事项时,可以将其清晰地归类到“重大错报风险或特别风险”“重大管理层判断”“重大交易或事项”三种来源中的一类或多类。事务所规模越大,其对准则较高的理解和执行能力,能帮助审计人员清晰阐述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认原因。本文借鉴陈丽红等(2021) 的方法,根据关键审计事项描述段是否注明确认原因,将样本公司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划分为归因清晰的关键审计事项(N_{Clear}) 和归因模糊的关键审计事项(N_{Vague}) 。

表 10 第(5) 、第(6) 列报告了事务所规模(*Big4* 和 *Big10*) 和归因清晰关键审计事项数量(N_{Clear}) 以及归因模糊关键审计事项数量(N_{Vague}) 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事务所规模与归因清晰关键审计事项数量(N_{Clear}) 显著正相关,而与归因模糊关键审计事项数量(N_{Vague}) 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大规模事务所的专业胜任能力更强,对被审计单位的业务理解更深入,风险导向审计方法落实更到位,能够严格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清晰阐述关键审计事项的确定原因。

^① 基于向量空间模型,通过 Python 自然语言处理库 Gensim 软件包,将文档根据 TF-IDF、LDA、LSI 等模型转化成向量模式。

表 10 事务所规模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类型

变量	(1) <i>N_industry</i>	(2) <i>N_specific</i>	(3) <i>CAM_Spec</i>	(4) <i>CAM_Mind</i>	(5) <i>N_Clear</i>	(6) <i>N_Vague</i>
<i>Big4</i>	-0.366*** (-5.35)	0.208*** (5.19)	0.135*** (6.00)	0.928*** (5.82)	0.074*** (2.63)	-0.413* (-1.71)
<i>Big10</i>	-0.013 (-0.64)	0.072*** (3.72)	0.024** (2.47)	0.018 (0.25)	0.056*** (4.38)	-0.231** (-2.29)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ndustry</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1.205*** (-2.70)	-0.953*** (-3.40)	0.343** (2.31)	-1.665 (-1.49)	-0.608*** (-3.43)	2.817* (1.88)
Adj_R ²	0.041	0.031	0.176	0.108	0.007	0.028
N	8995	8995	8995	8995	8995	8995

(三) 事务所规模、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与审计质量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提高审计质量(杨明增等,2018;吴溪等,2019;Reid et al, 2019),本文进一步考察事务所规模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充分性对审计质量的共同影响。采用修正的 Jones 模型计算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Abs_DA*)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构建模型(2)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11。

$$Abs_DA = \beta_0 + \beta_1 Big4 * Adequacy + \beta_2 Big10 * Adequacy + \beta_3 Big4 + \beta_4 Big10 + \beta_5 Adequacy + \sum Controls + Fixed_Effect + \varepsilon \quad (2)$$

表 11 事务所规模、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变量	(1) <i>Abs_DA</i>	(2) <i>Abs_DA</i>	(3) <i>Abs_DA</i>
<i>Big4 × Num</i>	-0.007** (-2.43)	—	—
<i>Big10 × Num</i>	-0.004* (-1.76)	—	—
<i>Big4 × LnWords</i>	—	-0.010* (-1.90)	—
<i>Big10 × LnWords</i>	—	-0.007* (-1.75)	—
<i>Big4 × LnCon</i>	—	—	-0.011** (-2.33)
<i>Big10 × LnCon</i>	—	—	-0.007** (-2.08)
<i>Big4</i>	-0.001(-0.13)	0.055(1.51)	-0.008** (-2.45)
<i>Big10</i>	-0.001(-0.11)	0.042(1.61)	-0.002(-1.03)
<i>Num</i>	0.001(0.39)	—	—
<i>LnWords</i>	—	-0.001(-0.32)	—
<i>LnCon</i>	—	—	-0.001(-0.46)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ndustry</i>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047** (2.10)	0.058* (1.72)	0.072*** (2.92)
Pseudo R ²	0.1465	0.2052	0.2311
N	8680	8680	8680

表 11 报告了事务所规模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充分性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Abs_DA*)的回归结果。事务所规模(*Big4*和*Big10*)与关键审计事项充分性(*Num*、*LnWords*和*LnCon*)的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相比于小规模事务所,大规模事务所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越充分,公司操控应计利润的可能性

就越低,即大规模事务所通过披露更充分的关键审计事项提高了财务报告的审计质量。

六、结 论

“做大做强”战略和审计报告改革都是近年来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重要变革,但鲜有文献检验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报告改革的影响。本文探究了事务所规模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以及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规模越大的事务所越倾向于充分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大规模事务所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更多、关键审计事项描述段和应对段的篇幅更长,且更愿意针对关键审计事项进行积极评价。在进一步分析中还发现,大所在进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时,文本相似度更低,披露的公司特性信息更多,在关键审计事项归因分析时更清晰,并倾向采用积极结论性方式进行具体评价。最后,本文还发现大规模事务所在充分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后,其审计质量也得到提升。

本文研究发现无论是国际“四大”还是国内“十大”均能够充分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并通过充分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提升财务报告的审计质量,这意味着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取得了预期成效,也为积极推动“十四五”时期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可行途径。其政策含义在于:首先,我国监管部门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继续大力推进事务所“做大做强做优”,推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新时代国家建设,满足资本市场和市场经济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更高要求,重点围绕国内“十大”事务所,打造社会公认信誉好、能力强、质量高且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优质本土事务所品牌。其次,监管部门应当进一步引导事务所对关键审计事项的具体披露,制定关键审计事项的定量与定性判断标准,规范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格式,对事务所高层领导开展相关培训,提高其对关键审计事项的重视度,加强监管部门与执法部门的协同,加大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质量的检查,设法确保审计报告改革效果。最后,事务所及审计师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时,应明确关键审计事项具体归因类型,针对每一个关键审计事项进行积极的结论性评价,提高关键审计事项的可读性与精确度,突出企业特性风险信息,避免关键审计事项流于同质化与模板化,从而提升事务所的服务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改善我国审计市场的信息环境。

参考文献:

- 陈丽红,易冰心,殷旻昊,等,2021. 行业专家审计师会充分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吗? [J]. 会计研究(2): 164-175.
- 陈丽红,张呈,张龙平,等,2019.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盈余价值相关性[J]. 审计研究(3): 65-74.
- 陈小林,王玉涛,陈运森,2013. 事务所规模、审计行业专长与知情交易概率[J]. 会计研究(2): 69-77.
- 韩冬梅,张继勋,2018.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审计人员感知的审计责任[J]. 审计研究(4): 70-76.
- 刘向强,李沁洋,2019. 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与并购业绩补偿承诺[J]. 审计研究(6): 79-86.
- 路军,张金丹,2018. 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初步研究——来自 A+H 股上市公司的证据[J]. 会计研究(2): 83-89.
- 冉明东,徐耀珍,2017. 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改进研究——基于我国审计报告改革试点样本的分析[J]. 审计研究(5): 62-69.
- 王艳艳,许锐,王成龙,等,2018. 关键审计事项段能够提高审计报告的沟通价值吗? [J]. 会计研究(6): 86-93.
- 吴溪,范昱江,杨育龙,2019. 关键审计事项与审计后会计信息质量相关吗——来自资产减值事项的证据[J]. 会计研究(12): 65-71.
- 薛杰,邓英雯,张敏,2020. 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职业责任保险与首次业务承接[J]. 会计研究(11): 152-169.
- 杨明增,张钦成,王子涵,2018. 审计报告新准则实施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 2016 年 A+H 股上市公司审计的准自然实验证据[J]. 审计研究(5): 74-81.
- 于鹏,申慧慧,2018. 监管距离、事务所规模与盈余质量[J]. 审计研究(5): 105-112.
- 张继勋,倪古强,张广冬,2019. 关键审计事项的结论性评价与投资者的投资判断[J]. 会计研究(7): 90-96.
- 张金丹,路军,李连华,2019. 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信息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吗? ——报表盈余和市场感知双维度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6): 85-91.
- 张娟,李虎,王兵,2010. 审计师选择、信号传递和资本结构优化调整——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审计与

经济研究(5):33-39.

周泽将,胡帮国,庄涛,2020.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内部控制质量[J]. 审计研究(6):114-121.

周中胜,贺超,邵蔚,2020.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审计费用[J]. 审计研究(6):68-76.

ALICKE M D, BUCKINGHAM J, ZELL E, et al, 2008. Culpable Control and 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in the Psychology of Blame[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10):1371-1381.

BRASEL K, DOXEY M M, GRENIER J H, et al, 2016. Risk Disclosure Preceding Negative Outcomes: The Effects of Reporting Critical Audit Matters on Judgments of Auditor Liability[J]. Accounting Review, 91(5):1345-1362.

BROWN S V, TUCKER J W, 2011. Large-Sample Evidence on Firms' Year-Over-Year MD&A Modification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9(2):309-346.

CHANEY P K, JETER D, SHIVAKUMAR L, 2004. Self-Selection of Auditors and Audit Pricing in Private Firm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79(1):51-72.

CHEN J Z, CHEN M H, CHIN C L, et al, 2019. Do Firms That Have a Common Signing Auditor Exhibit Higher Earnings Comparability?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95(3):115-143.

CHRISTENSEN B E, GLOVER S M, WOLFE C J, 2014. Do Critical Audit Matter Paragraphs in the Audit Report Change Nonprofessional Investors' Decision to Invest?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33(4):71-93.

DEANGELO L E, 1981.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3):183-199.

DYE R A, 1993. Auditing Standards, Legal Liability, and Auditor Weal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5):887-914.

FRANCIS J R, PINNUCK M L, WATANABE O, 2014. Auditor Style and Financial Statement Comparability[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9(2):605-633.

FRANCIS J R, YU M D, 2009. Big4 Office Size and Audit Quality[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4(5):1521-1552.

GUL F A, WU D, YANG Z, 2013. Do Individual Auditors Affect Audit Quality? Evidence from Archival Data[J]. The Accounting Review, 88(6):1993-2023.

GUTIERREZ E, MINUTTI-MEZA M, TATUM K W, et al, 2018. Consequences of Adopting an Expanded Auditor's Report in the United Kingdom[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3(4):1543-1587.

IAASB, 2011. Enhancing the Value of Auditor Reporting: Exploring Options for Change[R]. New York, NY: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

KACHELMEIER S J, DAN R, SCHMIDT J J, et al, 2019. The Forewarning Effect of Critical Audit Matter Disclosures Involving Measurement Uncertainty[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7(4):2186-2212.

KÖHLER A, RATZINGER-SAKE N, THEIS J, 2020. The Effects of Key Audit Matters on the Auditor's Report's Communicative Value: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Investment Professionals and Non-Professional Investors[J]. Accounting in Europe, 17(4):1-24.

LAI S, LI Z, YANG Y G, 2020. East, West, Home's Best: Do Local CEOs Behave Less Myopically?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95(2):227-255.

LENNOX C S, SCHMIDT J J, THOMPSON A, 2021. Why Are Expanded Audit Reports Not Informative to Investors? Evidence from the UK[R].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REID L C, CARCELLO J V, LI C, et al, 2019. Impact of Auditor Report Changes on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and Audit Cost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6(3):1501-1539.

SIROIS L P, BÉDARD J, BERA P, 2018. The Informational Value of Key Audit Matters in the Auditor's Report: Evidence from an Eye-tracking Study[J]. Accounting Horizons, 32(2):141-162.

VELTE P, 2018. Does Gender Diversity in the Audit Committee Influence Key Audit Matters' Readability in the Audit Report? UK Evidence[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5(5):748-755.

责任编辑:钱翠翠